

新时期文学场域

XINSHIQI WENXUECHANGYU YANJIU

初清华 著

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人民
出版
社

新时期文学场域

XINSHIQI WENXUECHANGYU YANJIU

初清华



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方雅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初清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8807-5

I. 新… II. 初…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1036 号

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

XINSHIQI WENXUE CHANGYU YANJIU

初清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22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807-5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王 尧

初清华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在修订之后即将付梓，作为她的导师和同行我为之高兴。本书出版之际，适逢学界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因而有了特别的意义。学界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初清华博士这一代青年学者对种种问题的新思考，我想应当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动力之一。当下的研究生教育有诸多难题，其中之一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确立。像中国文学这一基础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之难，几乎是普遍性的。我在和初清华讨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提出了三点“指导性”意见：要有“问题意识”，如果没有，就不可能有好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以后的研究领域；当代文学研究需要由扎实的文献基础，而不是相反；可以用新理论新方法，但要融会贯通，要与研究对象契合。她的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在几番讨论后，她确定自己做“新时期文学”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新时期文学研究差不多是“显学”，如何在大家似乎很熟悉的领域做出自己的特色，是对初清华的一个考验。初清华在经过深入的思考之后，提出运用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又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新时期”的“文学场域”。她所提出的方法与切入点，我以为能够对“新时期文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我们现在读到的《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实现了初清华写作论文的初衷，她始终注意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的落实以及

两者之间的契合,由此,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富有创新性的阐释。“文学场”理论由西入中,以之研究文学中国学界也不乏探索性的成果。初清华在尊重和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批判和修正,显示了她试图在扬弃中形成自己的观点与路径的努力。初清华清理了“文学场”理论由西入中后的差异,在她看来:在方法领域中,该理论所提倡的是以“场”为框架的文本研究与语境研究的结合,要用“文学场”的概念突破文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文本/语境的对立;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应用过程中,学界对“场域”理论的接受,则大多把“场域”理解为“历史情境”和“文学现场”,选择了对文学生产机制和生产过程的描述与研究,以及对原始材料的重视。一段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制度的重视、对文学生产过程的考察等,都反映了中国学者在运用“文学场”理论时的特色。初清华基本接受了这样的理解和选择,但重要的是她作出了修正、补充和发展,可以说是超越了目前研究的局限,这是本书最具价值的部分之一。将文本与语境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是这些年的共识,仅以文本为中心不足以阐释经典何以产生。如果回到“语境”或“场域”,那么“历史情境”或“文学现场”的结构又是什么?“文学场”在重视了“社会关系”以后又疏忽了什么,而这一疏忽又怎样影响了对“内部”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初清华思考的中心以及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她在这个方向的思考清晰以后,论文的写作与最终成果也就有了富有个人特性的学术价值。应当说,初清华的《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做到了这一点。初清华对“场域”理论“得失”的两面保持了清醒。她指出,“场域”理论的提出,虽然为以往单纯从“政治—文学”二元模式的体制研究中,引入“经济资本”的因素提供了可能,但社会学的研究视点使布尔迪厄把“文学场”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斗争与展现,很容易将文学问题与阶级、权力纠缠不清。在意识到这种“危险”之后,初清华重视了“文学场”的知识性特征,

避免把文学“场域”研究等同于文学“制度”的外部研究，以此克服运用“场域”理论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局限。初清华使用了文学“知识场”概念，她从法国社会学家“场域”理论得到启发，但她的“文学知识场”概念与布尔迪厄社会学批评中的“文学场”概念有所不同。她把“文学场”分为“实场”和“虚场”来研究，又视为一体之两面，从文学知识类型及其谱系发展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学场”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寓所，更是受各种门类知识话语青睐的栖身之处，游荡在场中的幽灵不再只是作品，还包括不同类别、相互纠结着的文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是所有能够进入特定时期文学场域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和经验。正是这些不断被传承并要求创新的知识经验，如黏合剂般把作者、作品、读者整个文学活动与社会水乳交融成一体。在这样的思路中，初清华对新时期文学场域的考察和研究卓有成效。《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的上篇，以新时期文学实场为主要论述对象，探讨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新生成与体制的重建。在这个部分，初清华在分析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建过程时，提出了政治、文学界、人民成为新时期文学知识生产的三种决定性力量，并仔细考察了“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文学体制的雏形以及三元文学体制确立的过程，分析文化身份与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出现分化现象。我以为，这是对新时期文学“历史情境”的有效清理，她注意到了文学场重建过程中的蜕变、冲突域选择，从而在复杂性的层面上以自己的方式返回了“文学现场”。本书的下篇，主要是以新时期文学“虚场”为考察对象，也就是对新时期文学场域中的文学观念和知识构成的研究，大致分析了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国家意识形态文学和通俗文学等文学知识谱系的内部构造以及复杂关系。这一部分从外部研究转入到了内部，也就是她所说的“虚场”与“实场”的结合，她想回答的是：新时期这一特定阶段的文学场域中有哪些类型的创作，这些作品是以怎样的理论知识为指

导？不同类型的文学知识谱系间形成怎样的关系？某一时期某种类型文学的主导地位如何确立？依靠的标准是什么？谁制定的标准？该标准对文学知识的再生产方式有何影响？初清华在这本书中当然无法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她的追问贯穿始终。这应当成为她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初清华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对自己各方面的期许都高。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当下，仍然怀抱学术理想，甘于寂寞，潜心读书，以学术安身立命当属不易。导师的责任或许就是发现和培育“读书种子”，“种子”再生长开花结果，于是便有“薪火相传”。很多年前，我特别尊敬的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严迪昌先生，他在我担任行政工作时告诫我：要发现和保护“读书种子”。我一直视严先生的话为一种教育理想。初清华在学术道路上还会往前走，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但我相信她不会走上岔道（学术上的岔道也是阡陌条条），她会乐于做一个“读书种子”。在日常生活中，初清华单纯处世，热情洋溢，乐于助人，礼数周到，有侠义心肠。这与她在孔孟之乡长大有关。世间不免险恶，初清华以单纯对待，虽然也偶尔遭遇挫折，但她总是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保持人生的暖意。这种单纯和热情，也让她在生活中充满快乐。这种状态，对一个读书人来说也很重要。可能是因为我受过太多的训诫，喜欢中庸与平和地生存着，只有在“原则问题”上自己从不妥协。初清华刚到苏州时，我感觉她心气很高，好发议论，个性鲜明。若有学术讲座，她总是坐在前排，而且常常是第一个向讲演者发问，据别人告诉我，她提问题有时还会“穷追不舍”。我相信这很像她，因为在我的课上，讨论到什么问题时，她同样不依不饶，即便如我不仅是导师而且也是个比较善辩的人，但都很难说服她。对初清华这样的风格，我并不否定，做学术如果没有个性，要有所发展也难，导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个性，但我期待她沉潜并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我记得我为此找她谈话，她向我解释，我用了比较重的口

气说话,她就没有再说什么。后来有同事告诉,初清华听讲座,不再第一个发问了。我闻之,心情也复杂。其实初清华的个性并未“修改”,但她懂得了首先要倾听,然后再质疑。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初清华自己告诉我,她当时对我的意见很“疙瘩”,现在想通了。她在做博士论文时,能够潜心收集整理文献,以之为论述的根据,很受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肯定,其实这与她的性格有所内敛有关。她在学会质疑别人时,更懂得了如何质疑自己的观点与方法。这是初清华读博士期间的一个进步。我个人以为,一个好的学者,是需要有自我批判精神的。我想,初清华会这样看待自己现在的研究成果,重新出发。

2009年10月于“三槐堂”

目 录

导 言 重塑新时期文学世界·····	(1)
一、加与减的悖论——八九十年代研究新时期文学的综述·····	(3)
二、“文学知识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点·····	(12)

上篇 文学场域重新生成与三元文学体制确立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新生成·····	(28)
第一节 重返“天安门”：“人民”话语再现文学场·····	(28)
第二节 文学期刊与新时期文学场域重建·····	(35)
第三节 “政治”隐显于“二为”方向中·····	(43)
第二章 文艺政策、文艺团体与文学体制改革·····	(52)
第一节 《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译文修改与文艺政策重心 转移·····	(53)
第二节 文联、作协与新时期文学领导体制·····	(61)
第三节 文学群体与新时期文学知识生产—传播体制·····	(69)
第三章 文化身份与文学界之分化·····	(78)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场域中的文化身份差异·····	(79)
第二节 聚焦《在社会的档案里》·····	(87)
第三节 “苦恋”风波·····	(91)
第四节 所谓“十六年”·····	(98)

下篇 新时期文学场域中的知识谱系

第四章 尽显风流的现实主义文学	(107)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真实性”原则的演变	(107)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证:新时期创作与现实的暧昧关系	(119)
第五章 毁誉参半的浪漫主义	(133)
第一节 隐匿于文学研究中的浪漫主义文学知识	(134)
第二节 想象与抒情: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浪漫主义	(141)
第六章 势不可挡的“现代派”文学	(158)
第一节 外国文学研究与“现代派”入场	(158)
第二节 “人”与“语言”:新时期“现代派”文学知识的两个支点	(165)
第三节 理性秩序的重建与坍塌:“现代派”文学创作的突破口	(172)
第七章 民间文学与“文人化”:通俗文学迂回入场	(183)
第一节 身份模糊的“通俗文学”在文学整理中悄然入场	(184)
第二节 “传奇文学”、“法制文学”与“新故事”:新时期通俗文学 知识形态	(196)
结论 新时期三元文学体制与不同谱系知识话语的扭结	(211)
参考文献	(217)
后 记	(224)

导言 重塑新时期文学世界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新时期文学”该如何界定，从1980年代至今都还是个问题。就概念的外延而言，仅对“新时期文学”起止时间的界定目前就有几种不同说法^①。“新时期文学”起点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1976年；一是以1978年。对于“新时期文学”终点，则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以1987年；一是以1989年；一是以1992年；还有一种则是认为新时期文学至今没有终结，“仍然用‘新时期文学20年’来概括中国文学自70年代末以来所走过的文学里程”^②。而每一种分期方法都关涉着该研究者对于新时期文学内涵的理解，因此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评价也自会不同。有人说，“新时期文学光彩遥遥呼应着世纪初的‘五四’，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也有人说，“新时期文学存有危机，不是五四文学的延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③，如此截然相反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说明新时期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

如果把新时期文学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相比起“文革”文学与1990年代

^① 1976—1992年(吴家荣《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中提出起于1976年，止于1987年的观点，他是“以文学自身的内部变化来把握文学史的转折”(而他认为“学术界通常把粉碎‘四人帮’后，即1976年以后至1989年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作‘新时期’”)。更多的研究者是把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即1978年。以1989年为终点，是因为1989年3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开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文艺体制改革。这不仅表明新时期文学运动的商品化具有了完全的合法性，更是促使从此以后的文学运动向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郝明工：《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运动的历史命名——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到后新时期文学》，《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③ 圆明：《新时期文学讨论会述略》，《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文学在整体形态方面的强烈反差,作为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新时期文学”,其过渡期的特征自然会被凸现出来。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是一种转型期文学,是从处于政治—文学二元模式中的“文革”文学转为政治体制影响逐渐式微、经济(特别是出版业等媒体)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的1990年代文学间的过渡。这个过渡期的起点,我把它定为1976年“四五”运动,这是基于研究“文革”后文学知识场如何重新生成的考虑。而以1987年为终点则主要是基于新时期出版业改革对于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影响,这一年国家对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基本完成:发行体制基本实现完全市场化,机构改革方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同时也开展了对全国报刊出版正规化的全面整顿,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两个文件为标志^①,提出所有报刊要重新登记注册、各地建立新闻出版局、制定出版法、加强对图书市场的管理等要求,这表明国家对新时期文学知识再生产活动的管理体制逐步健全起来,“庙堂”与“江湖”的对立也从此越来越清晰。因此,本文所谓“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指的就是以1976年至1987年间文学为主要对象的研究。

在新时期文学场域里,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文学知识话语^②，“文革”后它们通过出版、翻译、创作等方式进入并存于新时期的文学场域中,同时也在批评和创作中不断调整文本形态以适应时代的观念,以赢得更多的接受者。由于“人民”的砝码在新时期文学生产体制中越来越重,以及时人对现代化与民族化、西化间复杂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种种分歧,使得新时期文学场域的这五种文学知识类型力量对比并不均衡,而是存在强弱差异,并且纷纷借助于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理论话语来争夺在新时期文学场域中更为有利的位置,更多发言权。这种分化早在1979年就已经有所显露,特别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为“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出现而欢呼,现代主义文学因其契合了当时文学知识分子对民族“现代性”的想象而获得文学场域中的合法地

^① 一是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一是198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7、1355页。

^② 按照这些知识的理论体系,我把它们分为国家意识形态文学、通俗文学、知识分子文学,而知识分子文学又可以细分为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尽管这样的分类可能有不周延之处,尚未找到更好的分类方法。

位时,通俗文学尽管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赢得更多的读者市场,却遭到来自很多文艺界人士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联合抵制。而浪漫主义文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文学虽然在文学界声音微弱,但仍不绝如缕。正是由于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文学知识话语,因此对于某一文学现象的认识总是会存在分歧、引发论争,又在论争中改变着各种类型知识话语间力量的对比。“论争”成为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尤为重要的现象,这种“论争”能够贯穿新时期文学始终,要归功于随文学实践发展而不断在“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模式中作出调整的新时期文学体制。

以往1980年代、1990年代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虽然在策略上存在着“加”与“减”的差异,但所反映出研究者的思维模式却基本一致:大都局限在政治—文学的“二元”模式中^①探讨,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文学的断裂性发展和流变,容易遮蔽掉无法进入二元模式中的一些资料,因而很难准确解释有关1990年代文学与1980年代文学间如何联系的问题,也很难对某些新时期文学现象作出更为精确的理解和评价。因此,继续进行新时期文学研究,必须超越已有的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加与减的悖论——八九十年代研究

新时期文学的综述

当“新时期文学”被定格为某个历史片断的剪影,后来者对其研究的所有文章都不过是一种想象或臆测。且不说每个人心中对新时期文学都有一个或清晰或模糊的认识,单是从已出版的专著和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来看,足可称得上是洋洋大观^②。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文章,按研究方式大体可分为共时

^① 陈思和先生1990年代就提出“民间”的概念,我对新时期文学的思考和认识很受他的启发。但是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看似增加了“民间”的视角,却并没有摆脱二元思维模式,走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政治—文学”模式转为强调“民间—文学”模式,似有过于强调“民间”对于文学的意义之嫌疑。

^② 本文收集到单是以“新时期文学”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628篇(1980—2005)和专著(包括各种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新时期文学部分的论述)85种,根据概率统计原理,这种随机选择搜集的资料应该可以具有代表性。

性的文学批评、某种理论的专题研究和文学史的历时性研究,但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相互包容的^①。由于不同时期的批评研究文章所运用的批评话语、评价标准,代表的是不同时代批评者的理论视界和知识背景,因此按时间则大体可分为:同时期的批评与1990年代以来的研究。由于远近距离不同而形成的审美感受、知识结构差别较大,使得研究者选择的研究视角大异其趣,因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各不相同。在1980年代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中,1986年掀起一个高潮。1986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北京召开了“新时期10年文学讨论会”,讨论如何评价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刘晓波在会上提出的“新时期文学危机论”^②,引起学界争论。而鉴于1980年代后期文学创作发生转型,1992年谢冕提出了“后新时期文学”^③的概念。冯骥才、张颐武、王宁等人纷纷著文表示认同“新时期文学”在1980年代末已经终结。同时期的文学研究^④,以批评为主,处于相同的话语环境,并且多是近距离、“印象”式^⑤的回

①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② 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上海文化艺术报》1986年11月21日。

③ 尽管对文学的这种转型已达成共识,但是“后新时期文学”的定义只为一小部分人所接受,从后来研究文章的数量可见一斑。1993、1994、1995、1996年还算最火热的时候,以“后新时期”为题目的研究文章分别为14、14、12、8篇。1992—2004年,对“后新时期”文学的论述,总共也就只有73篇。

④ 包括1980—1989年报刊发表的批评文章和研究专著,这些研究专著中大多是论文集,1985年以后才出现了少量具有阶段性总结特点的和运用某种理论的个人研究专著。总结性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为代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某一角度研究新时期文学的专著主要有以下几种: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南帆:《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席杨:《选择与重构——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等。

⑤ 当时的评论者已经认识到当时批评的特点是“印象”式及其意义。许子东在《印象:批评中的一种“生气”》(《中国青年报》1985年10月11日)中写道,“‘印象’不仅是批评的前提,而且还是一种批评能力。既然深邃的思辨必须建筑于独到的印象与坚实的感性基础之上,那么这印象与感性,不也就是一种主体性力量吗?声、光、色、味的瞬间效应,主、客体(批评家与作品)的瞬间碰撞,很可能就凝聚了一个人(批评家也是人)几十年的人生阅历、情绪积淀、社会经验和理论储备”“我承认,我自己正是在各种高深理论与大量翔实资料的重重包围中,才领悟到印象和感觉的重要性”“我逐渐发现,种种理论乃至体系,都不过是在帮助我推动我去更细更深地捕捉、玩味和体验那种‘印象’——那种在我与艺术品之间的心理和情绪的对应关系,而不是相反要使我淡忘、轻视乃至抛弃这种‘印象’。因此,我觉得,‘印象’事实上伴随着文学批评的全过程。”

顾性点评,因此也可以把它们看做是所批评对象的扩展性说明,还有一些阶段性的总结评价,这都是后来研究者形成和检验所作判断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些同时期的批评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加”的过程,与文学创作一起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现场,共同构成了种种斑斓多姿、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

而颇为悖谬的是,1980年代的文学原本是试图挣脱外加在身上的政治束缚、追求主体性和文学独立品格的演出,本应是一个“减”的过程,在文学研究中却是以“加”为策略来实现的。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可谓这种“加”策略的表现之一种。他们提出这一概念的目就是要把“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虽然也强调了文学语言结构,指向的却是“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过程”,他们选择的论说策略,则是给以往“按照某一种历史哲学,依照一定的参照系统和一定的价值标准”被删削、整理并重新组合过的文学史,加入“历史”、“美学”的内容^①,表明他们所谓的“文学自身”并不是语言构成的文本,而是要用审美的、历史的标准,把政治话语从文学中驱逐出去。这深深印着时代流行观念“文学即人学”的烙印。如果按照李扬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期进行知识谱系学考察后得出的观点^②,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意味着要颠覆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的文学进化论的观点,要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对文学进行价值重估。

1980年代后期文学学术研究中一个颇为重要、影响深远的现象: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是“加”法则另一个更为直接的体现者。尽管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时,并没有明确打出用历史的、审美的标准代替政治标准“重写文学史”的旗帜,正如很多论者都已经看到并指出的那样,二者是前后相继的,这种“加”本身就是一种改写、“重写”。作为一种学术主张,“重写文学史”是陈思和、王晓明在主持《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时明确提出的。这一专栏从《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推出到1989年第6期结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② 李扬:《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从“当代文学”的“说法”谈起》,《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束,共发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探讨文章40多篇。严格说来,这些文章主要是对以往文学史中几乎已有定论的一些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重要现象的价值重新评估,表面看来,似乎跟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联系不大,但是,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的研究,都是新时期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就在于,既是同时期理论能力的反映,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而且可以看出,当批评家们心浮气躁地忙于运用各种时髦的“后”理论,来参与新时期的文学再生产活动时,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很难保持心平气和。把五六十年代一大批文学史奉为“经典”和“样本”的作品,以否定的态度进行评价,抬高现代文学研究中被遮蔽的一些文学作品如鸳鸯蝴蝶派的地位,尽管本质上还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体现,但客观上,是为文学研究的学术化、科学化“加”了许多新元素、新思路。特别是在审美的、历史的原则基础上又提出多元的、个性化的原则,更是对过去统一模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彻底否定。

虽然讨论是以学术的名义进行,结语也谨慎回避政治色彩^①,却仍藏不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与“重写文学史”主张背后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要通过对“五四”启蒙文学传统价值的肯定、对革命文艺的重估来确证当代知识分子在与“大众”、“革命”关系中的“启蒙者”、“革命者”的身份^②。在这种文学史写作方法大讨论的背景下,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大多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或许可以说,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研究中采取“加”的形式达到“减”的目的的策略,也就是藉美学、历史之力来试图清除政治影响的策略,把文学与政治问题迂回转换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探讨,这种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委婉

^① 毛时安的论文《不断深化对文学史的认识》(《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在特定的气氛下,总结了这次讨论,认为这次讨论注重学术性和科学性,在讨论中强调以建设思维代替破坏性思维,强调以文学标准代替抽象的观念标准,强调方法上以多视点代替单视角。言语间尽量避免与政治标准的针锋相对。

^② 这一点在当时和随后发表的,如姜静楠:《“重写文学史”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2期)、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罗守让:《文学史能这样重写吗?》(《文艺报》1990年5月26日)、林志浩:《重写文学史要端正指导思想》(《求是》1990年第2期)等批评文章中被指出,尽管有些是上纲上线的批评、指责,颇有借政治压人的嫌疑,但这些倡导者谁又真的能撇清自己思想中的政治参与意识呢?

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出文学知识分子对文学意识形态发言的不自信。

由于1980年代的文学研究者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大多还是局限在卡尔·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即以“自由漂浮”、“非依附性”^①为主要特征,囿于人文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功能的范畴之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文学知识分子专业“知识批判”的途径还在于文本技巧的创新,这使得他们所谓的“纯文学”仍然是以“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结构为参照系。许多人曾经天真地以为把政治从文学中减去,就可以通向文学现代化的美好前景,而几乎无暇顾及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况且文学从来就没有纯粹过^②。

坚守“纯文学”的品位和立场,是新时期文学批评和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潜规则,虽然不如1990年代张扬,却也是深得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者之心。早在新时期文学之初“文艺与政治”等问题的论争中,在追求“文艺民主”、“创作自由”的不懈斗争中,这一文学立场就已开始凸现出来。后来的研究者也大都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文学是独立自足的世界和文学重返自身,成为1980年代“纯文学”观的典型表述方式^③。有论者在回顾1980年代“纯文学”的定义时,也充分肯定这是一种“文学理想”及其产生的理论背景,用“更加关注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

① “顺便指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界,曼海姆的定义也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些坚持现代性立场的启蒙知识分子”,见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导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在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一文中,对西方学者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若干定义进行反思,提到有代表性的包括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的“自由漂浮”、“非依附性”特征,把知识分子理想化;葛兰西从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发,强调知识分子与特定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依存关系,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区别;古德纳的“新阶级”、萨义德的“业余者”、福柯提出的“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或译为“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区别、鲍曼的“阐释者”、布尔迪厄“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德布雷所批判的与媒体结盟的“追逐名声的动物”,尽管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可能会扮演如此多种角色,但在198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观念还停留在对“自由”、“公正”、“良心”等理性精神的追求上。

② 对于这一点,贺桂梅:《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问题的简略考察》(《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中有更为精辟的表述:“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将文学对抗于某一种政治话语及其写作方式时,隐匿了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特性,并将其抽象化为‘纯粹的文学’这一表述之中。”

③ 刘小新:《纯文学》,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